

# 当前扩大国内需求的制约因素

□ 许经勇

从 80 年代起,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一直是在两位数以上,但近年来所出现的下滑态势,却明显地超出人们的意料。因而,如何保持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鉴于当前国内市场需求萎缩,出口大幅度下降,规定了扩大国内需求,开拓国内市场,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和长期战略方针。现在,须要我们作进一步探讨的,是究竟有哪些主要因素,制约着我国国民经济的生长?

## (一)

当前我国国民经济增长乏力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足够的产业结构支持力度,产业结构调整 and 升级步履维艰。国民经济的生长总是以一定的产业结构为基础,靠相应的产业结构来支持。不论是以数量扩张为特征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或者是以效率提高为特征的集约型经济增长,都不例外。应当这样看,即改革开放 20 年来,我国经济年均增长速度 9.8 个百分点,既有总量扩张的作用,也有产业结构调整的贡献。80 年代初期轻工业的优先发展,80 年代中期以家用电器为代表的现代耐用消费品工业的大发展,80 年代后期以来的基础产业、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兴建,都是适应消费需求结构变化而出现产业结构的调整。使得我国的经济增长从第六个五年计划到第八个五年计划都保持着较快的速度,都获得新的产业结构基础。在过去一段时间内,人们对产业结构的支持作用,特别是产业结构调整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体会不深刻,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着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总量扩张来实现的场合,结构性矛盾往

往被掩盖起来,相应的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支持,也因此被淡化。然而,当着经济的增长主要是依靠效益的提高,总量扩张已不起主要作用的场合,结构性的矛盾就会被突出出来,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支持作用也会被突出出来。在这个时候,经济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产业结构的调整所带来的效益来支撑。如果这种支撑力度不强,经济增长趋缓乃至一定程度的回落,便是不可避免的事。1997 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明显滑坡,便是结构支持力度弱化的真实反映。

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受阻,致使投资收益率下滑,是影响我国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首先,是一些低效率的行业长期不能缩小或淘汰,最突出的是纺织业。其设备老化、重复建设严重等,既造成了生产能力的大量过剩,又形成了大量的冗员,结果成为 90 年代以来我国全行业长期亏损的一个产业,且因其占用了大量社会资金,相对地减少了社会可用资产;其次,是产业结构升级受阻,产生了大量的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加剧了国内市场的竞争,从而使企业陷入高成本、低物价的双重约束,导致企业利润大幅度下降,自然也就因此降低了企业的投资积极性;第三,是企业产权结构的不合理,造成了企业创造需求的能力很低。现代企业与传统企业不同的是,它借助于明晰的产权结构优势,以及与此相关的有效激励、监督机制,不仅具有了适应市场需求的能力,而且具有创造市场需求的能力。

目前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加速发展时期,基础工业、基础设施的需求相当旺盛,尽管投资向这方面已有所倾斜,但仍然满足不了规模庞大的需求。从

总体上说,我国基础设施还很落后,与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的要求还很不适应。农业基础脆弱的状况还远未根本改变;农村的水、电、路等基础设施的状况十分落后,严重制约了农村生产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态环境问题愈来愈尖锐;在铁路密度、复线率、电气化率、行车速度和集装箱、冷藏等现代化运输手段方面,与国外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区域性高速公路建设刚刚起步。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既是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任务,也是扩大内需、拉动当前经济增长的重大举措,而且投资风险较小、长期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较好,能为闲散资金找到出路,为下岗职工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创造较多的就业机会,有利于增加城乡居民消费,实现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当然,增加固定资产投资,拓宽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不应一哄而起,应当选择那些急需的、能有效带动国内需求的扩大,拉动经济增长,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产业和领域。当前,应将重点放在加强国直属粮库建设、农村电网的改造与建设、城镇经济适用住房和生态环境建设。

同时,伴随着重化工业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增强,以机械电子工业为代表的装备工业迫切需要加快发展,这既涉及到投资这类产品的现代化水平,又关系到消费类产品的升级换代。是产业结构升级的方向。可以预见,在我国经济的未来发展时期,支持经济增长的结构基础,将从能源、原材料为主的资源性产业,转变为高加工度、高附加值为主的机电产业。这就要求国内的投资需求,必须随着产品结构的升级与换代,以及部分需求向高级化变动而变动。新产业、新技术、新设备、新工艺、新材料的投资需求猛增,迫切要求投资品产业的生产结构能作出适应性和超前性调整。由于当前电子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已成为世界市场追求的趋势,如何适应新的市场需求,改变传统产业结构,开拓新的产业领域,以提高市场占有率,便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 (二)

随着我国市场化进程的加快,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逐渐地由供给约束转化为需求约束,需求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越来越大,需求的迅速扩张会拉动经济的快速增长,需求的不足也会极大地制约着经济的增长。从消费需求看,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是消费结构变化的主要动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收

入水平迅速提高,城市居民消费结构呈现出高级化、多样化的特点,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也有较大的变化。国内的投资需求也随着产品结构的升级、换代以及消费需求向高级化变动而变动。近几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消费需求结构从总体上说,已从满足“温饱型”结构向“小康型”结构转变,还有相当一部分较高收入的居民群体,消费结构类型正向“宽裕型”结构转变。消费者对产品的消费需求,也已从满足一般的吃、穿、用,逐步向住宅、交通、通信、计算机等高等级商品转变,并有相当一部分居民群体开始向教育、科技、旅游及精神产品消费领域转变。

但是,从总体上来说,我国经济中的确存在着“消费断层的问题”。即80年代与90年代前期支持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消费热点趋于平缓或衰弱,而新的能够有力带动我国经济增长的消费热点尚未形成或尚未积极发生作用。从居民消费结构内部各构成要素变化倾向,可以明显的看出,住房消费的比重,将会趋于上升。因为按照人们消费支出的不同形式,可以分为吃、穿、用、住、行。首先,从“吃”的方面看,恩格尔定律表明,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食物消费支出在个人消费总支出中的比重将会下降。这一定律对任何一个国家都是适用的。其次,从“穿”的方面看,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穿”的比重将会由基本稳定转向趋于下降。再次,从“用”的方面看,日用品、尤其是耐用消费品,随着人们收入的增加,它在消费结构中的比重将会迅速上升,但到一定程度后,比重上升的速度将会缓和乃至呈下降趋势。目前我国城镇的衣、食基本上得到满足,家用电器的普及率也高达90%几。正处在由衣、食、用的消费热点向住的消费热点转变过程中。与此相联系,住房消费在消费结构中呈上升的势头。从住房消费的需求收入弹性,也说明“住”在消费结构中的比重将会迅速上升。需求收入弹性是指需求的变化对收入变化的反映程度。一般地说,价值量越大、价格越高的消费品,其需求的收入弹性越大;而需求收入弹性越大,它在消费结构中的比重就上升越快。这意味着,随着我国城镇居民收入的不断增加,住房消费支出在消费总支出中的比重将迅速上升,人们增加的收入将相对集中投向住房消费,住房消费将成为新的消费热点和新的经济增长点。

作为我国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应当是市场需求量大、产业关联度高、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带动作用强的产业和产品。而房地产则具有这个特点,

即具有很高的产业关联度，能够带动与其相关联的近 30 个行业的发展。同时其消费市场的潜力又相当大，将是长期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很重要的经济增长点。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立新的住房供应体制。问题的焦点，又是集中在如何进一步探索符合我国目前低工资下的住房商品化道路。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关键是要解决住房价格与职工收入之间差距较大的矛盾。根据世界银行对许多国家考察后得出的结论，当住房价格与一般家庭年收入之比，保持在 3:1 至 6:1 之间，居民才有足够的购买支付能力，若它高于 6 倍，就很难形成具有强劲势头的消费市场。我国以前那种工资分配形式，是不利于促使人们购买自己的住房。即要求人们拿没有住房含量的低工资去购买价格颇高的商品住宅，显然是不切实际的。这是当前我国住房货币化难以较快推进的重要原因。1997 年底全国共有空置商品房 7038 万平方米，空置率为 15.99%，超过国际公认的合理范围(即 3% - 10%)。

我们前面说的衣、食、用，就城市来说，基本上是解决了，市场处于相对饱和状态。但对农村来说，其潜力还相当大。1997 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水平 1930 元，仅是城镇居民消费水平的 31.9%，全国县及县以下农村市场消费品零售总额仅占全国的 38.9%。扣除县城，县以下仅占 26%。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农民收入水平低且增长慢。当前主要是农产品价格下跌较多，“卖难”问题突出；乡镇企业在买方市场条件下竞争剧烈，经济效益严重下滑；受沿海地区经济不太景气，大量民工不得不重回农村，减少大量非农劳务收入。1997 年全国农村人均的纯收入增幅比 1996 年下降 4.4 个百分点。这种态势一直保持至今。这就必然限制着国内需求的扩大和国民经济的增长。

### (三)

城市化滞后，也是当前制约我国国内有效需求扩大、障碍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我国国民经济增长有三大动力源，即城市化、市场化和国际化，其中城市化是最重要的。如果说我国过去的城市化完成的是大规模低水平的数量扩张的话，那么今后我国的城市化将进入一个调整功能、适度集中的新阶段，这主要是通过现存大城市的调整性扩张和小城市的适度集中体现出来的。我国 10 万—20 万

人口的上千个小城市将会在未来 20 年渐成气候，并与大城市形成互补的城市网络，这一过程也将派生出巨额的投资与消费需求。今后十几年要实现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必须有足够的持续增长的需求支撑。而无论是消费需求还是投资需求，都是与城市化问题紧密相联的。从消费需求来看，农村人口在消费习惯、消费模式上与城市都有巨大的差别，消费示范效果扩散很慢。9 亿多农民实现的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由 80 年代前半期的 35% 降到 90 年代以来的 20%。如果这种消费习性与消费水平的民众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不发生变化，很难设想国民经济能保持长盛不衰的快速增长。目前全世界城市化程度平均为 45%，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程度平均为 90%，而我国的城市化程度仅 30%。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产生的一个严重结构畸形问题，是二元经济结构的矛盾。即城市化进展缓慢，城乡分割严重，城乡差距从一度缩小再次扩大为超过改革开放以前的程度。城镇化进程缓慢的一个后果就是占人口很大比重的农村居民收入较低，消费需求较低。目前我国重化工增长势头绝大部分是由城市居民消费升级引发的，占全体人口 70% 多的农村居民，消费结构远未达到足以引起工业增长向重化工业方式转换的时期。目前中国的市场表现出需求不足，生产能力过剩。据估计，我国目前生产能力过剩最严重的家用机电产品中，只有自行车和电风扇基本饱和，彩电、冰箱、洗衣机等 11 种产品的全国平均普及率仅在 25% 左右，如果我国农村城市化步伐能达到国际平均水平(45%)，我国市场需求就会呈现较好的梯度，仅家用电器产业至少还可以高速增长 20 年，耐用消费品对我国经济的拉动至少还有 10 多年。

我国城市化滞后在两方面对最终需求产生了制约作用。第一，压抑了一部分农村消费需求。由于体制和政策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特征依然十分明显，二元结构和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在许多地区还日益扩大，农村需求不足成为总需求不足的重要部分。这一方面表现在农村人均收入增长放慢，从而降低了一般消费品和耐用消费品需求的扩大；另一方面，由于城乡户籍制度的限制，使一些已经致富的农村人口无法城市化。城市既是一个“生产中心”，也是一个“消费中心”。由于这一部分人没有城市，所以其消费方式仍然是农村式的或传统式的，而非现代式的。城市人口在其生活达到小康之后，耐用消费品(住房、

汽车)和教育的投资及文化娱乐服务的消费将显著增加,但由于人口城市化所阻,农村的这一部分潜在需求没能转化为现实需求。这一结构失衡问题,越来越成为限制国内总需求扩大的重要因素。第二,城市化滞后对城市公共设施建设产生不利的影 响。我国长期存在的抑制城市化的传统户籍制度的相关政策,既压抑了城市公共投资的增长,也限制了第三产业的发展。这就要求现阶段我国的投资方向,应当是向着城市化方面倾斜,以加速城市化进程为中心,来调整我国的投资方向。要适当扩大居民住宅投资的比重,通过促进城市化,实现大规模剩余农业劳动力转移,拓展就业的空间和层次,实现收入支出结构和总水平的调整和升级,带动产业关系的转变和重组,从而形成新的宏观供求格局。

1998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深刻地指出:“发展小城镇,是带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大战略,有利于乡镇企业相对集中,更大规模地转移农业富余劳动力,避免向大中城市盲目流动,有利于提高农民素质,改善生活质量,也有利于扩大内需,推动国民经济更快地增长。”那么,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究竟有多大?首先,伴随着农民变市民,其消费方式也将发生质的变化,即由自给自足的实物消费转变为货币消费。目前我国农民的实物消费仅相当于市民的 $1/3$ ,现金消费仅相当于市民的 $1/5$ 。这意味着全国城镇人口比重提高一个百分点,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相应上升1.4个百分点,这至少可以拉动GDP增长0.5个百分点。实际上这是偏低的估计,因为发展小城镇不仅扩大了新的市民消费群体,还大大方便农民就近交换商品,有利于带动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活跃整个农村市场。其次,农民进城将促进房地产市场的繁荣。我国城镇人口比重每增加一个百分点,按每人建筑面积20平方米计算,需建房2.5亿平方米,每平方米造价以400元计,住房建设约需投入1000亿元。即使进城农民建房买房比例以一半计,将使全社会住房建设投资年增长10%左右。根据有关方面测算,我国住房建设每投入100元资金,可创造相关产出170—250元的需求,住房建设(包括其带动作用)增长10个百分点,可拉动GDP增长1个百分点。这样,仅建房一项就将拉动GDP增长约1个百分点。第三,小城镇发展必然带动包括交通、水电、通讯等公共设施的配套建设。从一些地区的实践经验表明,公共设施与住房建设投资约为四六开。以此推算,城镇人口比重提升

一个百分点,将拉动GDP增长约0.5个百分点。第四、小城镇发展,还有利于促进进城农民的经营性投入。小城镇作为发展农村二、三产业的载体,是先富起来的农民经商办厂的理想场所,是启动民间投资的切入点。对于先富起来的农民,最具吸引力的莫过于到城镇投资建房、办厂经商。农民手里有几个钱,首先花在建房上。到城镇建房变乡下人为城里人,这是年青一代农民的心愿。同样的建房,在农村就地建房与到城镇建房是一种质的飞跃。在农村建房,活钱变成了死资产。而在城镇建房既是消费又是投资,可以保值增值,具有莫大的吸引力。

综上所述,我国城市人口比重增加1个百分点,大体可以拉动GDP增长2个百分点。这在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疲软的情况下,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可以这样说,加快农村人口城镇化进程,无论是启动消费需求还是投资需求,近期经济增长还是长期发展,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是我国扩大内需的巨大潜力之所在。

#### (四)

所有制结构的变化,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演进最根本的制度原因,也是制约我国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在所有制结构变化中,最突出的特点是,国有资产比重迅速下降,非国有资产比重持续上升;而随着资产比重的变化,是不同所有制结构主体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更大变化。以工业为例,国有资产占全社会资产比重(不包括土地),由1978年的88%降到1995年的67%,非国有资产则上升到33%;而1978年国有经济的产值占81%,非国有经济产值占19%,1995年非国有经济的产值占66%,国有经济只占34%。我们须要正视的现实是,多年来非国有经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上升。据测算,1997年非国有经济在GDP中的比重为58%。1998年一季度全国工业增加值增长8.2%,其中非国有经济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高达75%。我们可以推算出,在工业中,非国有资产比重每上升一个百分点,对工业总产值的贡献大约为2.24个百分点,非国有经济的成长,将换来经济高速增长的空间。因此,如何为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创造一个适宜的环境,特别是在融资方面给予有力地支持,已经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事,而是一个事关重大的问题。

在过去一段时间,人们往往就乡镇企业看乡镇企业,而目前,人们更多的则是从国民经济全局的高度来看待乡镇企业。尽管我国乡镇企业的增长也经历了高峰、低谷的波浪型,但从整体上看,则是高速增长型经济。从最近几年看,1992年达到50.9%,1993年则更高达到65.1%。1991年至1995年间,年平均增长速度是42%,而到了1996年则猛降至21%,1997年又下降到18%,预计1998年将降至17%。与此相联系,乡镇企业的其他一些经济指标也都出现了大幅度下降。其出口增幅由“八五”期间的63.48%,下降到1996年的11.4%和1997年的16.5%,引进外资递增率从73%下降到15%和12%,吸纳劳动力则从719万人下降到647万人和400万人。同时,1997年乡镇企业亏损面达15%,比1996年上升7个百分点,亏损额600亿元,比1996年增长33%。关停企业近年来也大量增加,仅乡村集体企业1997年就达6.5万家。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对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作出重要贡献。1998年要实现国民经济8%的增长目标,乡镇企业的增长速度必须保持在18%。这个判断是有充足的依据。即经科学推算,乡镇企业增加值每增减3个百分点,就会影响国内生产总值增减1个百分点;乡镇工业增加值每增减2个百分点,就会影响全国工业增加值1个百分点。因此,“九五”计划中国民经济8%的增长速度,乡镇企业的贡献份额为56%,即4.48个百分点。

在非国有经济中,非公有制经济也是我国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就个体经济而言,1995年的工业产值比1985年增长51.54倍,1997年的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比1985年增长10.90倍。私营经济的发展也很快,1997年与1990年相比,工业产值增加31.2倍,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加42.1倍。1997年,在全社会工业增加值中,个体私营工业占17.4%,在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个体私营占36.77%。1993年以来,我国个体、私营经济发展进入快车道。1997年,全国个体经济从业人员达5441.9万人,营业额达13000多亿元;全国私营经济的从业人员达1349.3万人,注册资本达5140.12亿元。据统计,1996年,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包括个体、私营、外资在内的非公有制经济所占的比重已达24%,近两年又有比较大幅度的增长。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指出,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须要着重指出的是,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国有经济获得了很大发展,国有资产也在不断发展壮大。但是,横向地比,国有经济从总体上来说,经济效益是比较差的。与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及所占有的社会经济资源是很不相称,这在一定程度上必然会制约着国民经济的增长。据统计,1998年,国有企业的资产总额约占全部企业资产总额的65%左右,其中国有工业企业资产总额占全部工业企业资产总额60%左右。但国有工业总产值在全部工业总产值所占的比重仅30%左右,国有工业增加值在全部工业增加值所占比重仅20%左右。由于国有企业改革长期以来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使得其所掌握的资源不仅未能得到有效的利用,反而出现大面积的经营亏损和资产流失,这种状况如果不能得到及时的改变,必然会严重地制约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努力寻找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

## (五)

居民消费倾向偏低,也是影响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与前几轮启动经济增长相比,这次启动经济增长同样还是以率先扩大投资方式来刺激经济增长,但是启动经济的难度却加大了。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往启动的经济主要是通过扩张的货币政策,向工业领域注入大量银行贷款来实现的,货币供应量的扩张很快会导致经济的扩张,然而这次启动经济增长由于是在通货紧缩的条件下进行的,出现了“流通性陷阱”,导致1998年上半年扩张的货币政策,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为此,政府及时调整了政策,加大了财政的直接投资,才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二是以往启动经济增长的投资需求扩张,很快会拉动消费需求的扩张,从而使经济获得了再投资的动力。然而这次通过财政政策虽有效地扩张了投资需求,但并没有有效地引起消费需求的扩张,投资需求拉动消费需求的传导机制受到了阻碍。须知,如果不能有效地刺激消费需求,更大的投资需求将难以被激起,新增投资增加的产品没有市场,则只能增加库存,从而削弱了投资的效果。

当前我国居民消费倾向明显偏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是金融资产分布不均匀而形成的属于结构失衡型买方市场。目前我国有80%的金融资产掌握在20%左右的人手中。在城镇中,富裕层与相对贫困层

的差距呈扩大趋势。1989年,我国城镇居民中最富有的1/5家庭的收入占全部收入的29.38%,最贫困的1/5家庭的收入占全部收入的11.65%;至1994年,最富有的1/5家庭收入占全部收入的比重增至44.46%,最贫困的1/5家庭仅占全部收入的6.04%。而随着金融资产向某一部分阶层的集中,使得这部分人的消费支出在达到一个相对较高的稳定阶段后,收入的再增加收不到再有增加消费支出的需求,而是近乎全部变成了储蓄。这就必然造成要买的人买不起,买得起的人不需要购买的状况,导致消费断层的出现。

二、收入预期的不确定性。即居民有相当一部分金融资产不是来自持久性的收入,而是来自暂时性收入和非稳定性收入。也就是说,即使现期收入较高,未来收入预期却是很不确定的。因而不敢贸然把这部分收入转化为消费,而是转化为储蓄。与此相联系,在居民预期收入下降的情况下,其边际消费倾向也会跟着相应减少。目前已下岗的国有企业职工以及面临下岗压力的政府公务员、银行职员、税务职员、国有和集体乃至三资企业的职工等,普遍对未来收入的稳定来源产生怀疑,其所采取的对策是减少消费支出,增加储蓄,以备将来无收入之时的生活开支。这就会强化居民的储蓄倾向,从而产生利率下调、储蓄增加的情况。

三、个人的支出模式正在从局限于眼前日常消费支出转变为着眼于个人终身消费支出。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个人在养老、医疗、住房、教育和应付不测等方面的需要,都是由企业和政府提供的。个人获取这类资源所作出的努力,主要表现为获取身份的竞争,以及对行政级别的竞争。而其工资收入的支出,则主要集中在日常生活消费上。即使是存款,也大都是为了购买“大件”日用消费品。但是,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深入(目前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已达50%左右),传统福利制所提供的“物品”逐步转移给市场,个人在医疗、住房、教育、失业、养老、应付不测等方面的费用,更多地依赖于自己。这就要求个人在收支模式上必须作相应的调整。即从集中于眼前的消费支出转向兼于未来的消费支出模式。与这一转变相适应,目前很多个人储蓄存款的主要目的,不是持币待购“大件品”,而是着眼于应付个人的未来消费需要,以及着眼于这类消费的个人资产保值。在今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个人收入支出未来化的趋势还会进一步扩大,城乡居民的储蓄倾向将

会进一步增强。这也是造成居民消费倾向偏低,市场启动迟缓的重要原因。

## (六)

财政政策及其效应,也是影响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在买方市场或市场需求约束下,企业和银行金融机构对未来项目前景的预期较差,投资和扩大生产活动都比较谨慎,对货币需求量减少,形成通货紧缩。因而对利率杠杆的反应并不敏感。这说明企业对货币的需求,是货币供应量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而这种需求不仅取决于取得货币的条件,更主要的是取决于企业投资和扩大生产的欲望。在市场前景不好的情况下,即使筹资成本较低(连续6次降低贷款利率使企业少支付利息2600多亿元),取得贷款较为容易,企业也不会因此扩大资金的需求。货币政策空间愈来愈小,还因为央行要求各商业银行每年降低不良贷款比例2—3个百分点,以及强化对银行贷款的风险管理,出现人们通常所说的“惜贷”现象。近年来,我们一直强调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但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走势看,实际上从1996年开始就采取“适度从松”的货币政策,这突出表现在连续6次降低存贷款利率。但其所发生的效果并不明显。所以,1998年下半年以来中央确定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并辅之以适当的货币政策。为什么必须这样做?多方面的情况告诉我们,1999年发展经济遇到的困难可能会比1998年更大,特别是外贸出口形势更严峻,利用外资也会遇到新的困难;转变国内市场需求不足,社会投资不旺的状况还要有一个过程。1998年遭受特大洪涝灾害,灾后重建、水利建设和水毁工程的修复刻不容缓,工程巨大。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就业压力较大,出现一些新的社会矛盾。而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加财政投资,不仅有利于解决上述问题,还可以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拉动国民经济增长,增强我国经济发展后劲。预计1998年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1997年增长15%,其中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2%。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拉动国民经济增长,不仅有利于增加就业,也有利于增加财政收入。此外,有不少公共性基础设施投资项目,直接回报率低,回收周期长,必须主要依靠国家财政资金投入。

当然,由于财政政策所运用的减税增支和发行国债,总是与财政赤字的扩大相联系的。在国民经济存在着闲置资源(包括资金、劳力、设备能力、物资财

料等)的情况下,赤字财政是可以容忍其存在甚至扩大的。比如目前储蓄大于投资,银行资金存款大于贷款,在这种情况下,财政用发债方式向银行借1000亿元,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是没有危险的。但是,社会闲置资源毕竟是有限的,随着经济扩张的进行,迟早总出现资源瓶颈。况且,财政性扩张还要同时考虑信贷扩张的需要而不能挤掉后者。这就涉及到财政政策对货币政策所产生的“挤出效应”。所谓“挤出效应”,就是说银行买了财政的债券,它本来用这钱做贷款的,买了这1000亿元债券用着贷款的钱就少了,中央银行充分考虑到这一点,及时实施公开市场业务操作,扩充基础货币,使得商业银行不但能买1000亿元债券,还能有足够的钱发放贷款,支持国民经济的增长。

但是,在实施财政政策的过程中,也有一些因素限制着其效应的进一步发挥。这首先表现在,中央政府的公共投资,未能很好地刺激起地方的公共投资。由于中央政府公共投资结构比较单一,对刺激地方公共投资需求的作用是很有限的。如财政资金主要集中在铁路、公路、水利等基础设施上,而对城市的基础设施结构设施偏小,这就难以带动地方公共配套资金,也影响城市第三产业的发展。其次还表现在,在我国,为了解决结构优化问题,加大结构调整力度,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必须尽快建立一套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而这又需要财政资金的大量投入。但由于中央政府在这方面的投入偏少,如果没有中央政府的大量资金投入并发挥引导作用,地方政府参与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积极性就会大为降低。其次表现在,民间投资依然较为低迷。即中央政府大幅度增加公共投资,却没有很好地激起民间的投资。一是因为在基础设施“瓶颈”约束已大大减轻的情况下,靠加大基础设施投资会把投资需求搞上去,但带动的民间投资作用可能较弱;二是由于政府投

资在一定程度上会对民间投资产业“挤出效应”。当前企业投资、特别是民营企业投资热情不高,一方面是由于政府较多地增加公共投资会产生一种“挤出效应”,这将部分地抵消财政政策所产生的“乘数效应”。与此同时,财政投资主要是基建投资,技改投资则明显减少,且银行配套资金的贷款部分,也是以中长期贷款为主,因而造成了流动资金的明显不足,即长期资金“挤出”短期资金。另一方面是由于国内大多数企业面临的是“相对过剩”的市场环境,且它们的创新能力很低,在“低物价、高成本”的双重约束下,绝大部分行业的利润很低,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投什么,只能是亏什么。这是当前难以启动民间投资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就要求在增加国家投入的基础上,要更加注意调动和发挥全社会的投资积极性,努力为企业、集体和个人等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协调好他们的投资活动,增加他们的投资信心。同时还必须积极促进消费需求。我们发展经济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如果没有消费需求的支撑,投资就很难发挥效应,经济增长也难以持久。为此,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同时,还应注意千方百计开拓城乡市场,特别是挖掘农村市场的巨大潜力。努力创造就业机会,设法增加农民和城市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提高城乡消费者的购买力。

---

#### 参考文献:

①马洪等著:《中国发展研究》,中国发展出版社1998年版。

②石景云著:《经济增长与波动》,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作者:厦门大学经济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责任编辑:杨俊颖)